

CHANGZHENGRENHUACHANGZHENG

长征人

7

话长征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长征人话长征

7

主 编：王长龙
执行副主编：周国栋
副 主 编：顾玉清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目 录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	徐向前(1)
强渡嘉陵江·····	程世才(21)
打过嘉陵江去·····	高志荣(29)
拔“钉子”·····	韩东山(38)
夜袭涪江·····	吴仕智(44)
攻克剑门关·····	陈 康(48)
叫邓猴子尝尝红军的厉害·····	郑维山(60)
英雄少年找红军·····	曲 飞(70)
她们能顶半边天·····	赵 兰(82)
一支奇特的娘子军·····	林月琴(91)
征途漫漫红女兵·····	刘 坚(107)
铁姑娘担架队·····	刘照林(119)
烽烟滚滚过土门·····	郑维山(128)
光荣的任务·····	余洪远(136)
熬盐迎亲人·····	孟 瑜(149)
朝霞映照达维镇·····	韩东山(154)
红军团结胜利的篇章·····	李先念(163)

懋功会师·····	徐向前(172)
朱总司令来到兵站部·····	吴先恩(182)
娃娃宣传队·····	廖兴文(192)
一次意外的发现·····	肖永正(198)
小旗手·····	谭清林(202)
一场风波·····	杨明山(211)
草地纪事·····	张力雄(218)
牛蹄飘香·····	高明顺(224)
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	邓仕俊(228)
扫清障碍 打开通路·····	孙继争(234)
强攻腊子口·····	刘海清(240)
一路磨难一路歌·····	张 萍(244)
红军第四方面军长征初期组织序列·····	(249)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

徐向前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大会师的日子，已载入我国民主革命的光荣史册。它是举世闻名的红军万里长征胜利结束的标志；同时，又是中国革命的战略重心从南方移到北方，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过渡的重要里程碑。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是整个红军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支部队从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起，先后转战于川西平原、川西北、川西南、西康东部及甘南地区。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流血牺牲，不畏艰难险阻，数翻雪山，三过草地，打破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有力地策应了红一、二方面军的北上，为革命武装向大西北的战略转移，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也一度使这支英勇的红军队伍，遭受过不应有的挫折和损失。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程，艰难、曲折、复杂，有丰富的经验教训可资借鉴。

强渡嘉陵江 打破敌封锁

具有历史意义的长征，以红军主力在敌人重兵压迫下，脱离原有根据地，流动转战，寻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为主要特征。毫无疑义，这是党和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进行的一次战略大转移，或者叫战略总退却。“这种战略的目的就是要赢得时间，瓦解敌人，养精蓄锐，以便后来转为反攻。”继红一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之后开始的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当然也不会例外。

红四方面军源自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二年十月，因未能粉碎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被迫西征转战三千里，年底进军川北，开创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这块根据地的鼎盛时期，面积达四万二千平方公里，人口逾五百万，建立二十二个县市的革命政权，红军发展到五个军八万余人，严重危及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有力地配合了各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反“围剿”斗争。

那么，至一九三五年上半年，川陕革命根据地才形成两年多时间，红四方面军为什么会撤出那里，实行战略转移呢？

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当时的形势和条件说起。

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立脚生根，基本原因之一，就是利用了敌人营垒的矛盾和缺口。那时，四川军阀各领“防地”，混战不已，并且反对蒋介石的势力入川“剿

赤”，从而给了红军以可乘之隙。但是，从一九三三年秋末起，这个条件便逐步发生了变化。四川军阀混战结束，形成以刘湘为头子的相对统一局面；红军经过反三路围攻和三次进攻战役，迅猛发展，直接危及各路军阀的生存。于是，他们联合起来，集中二十多万兵力，向我根据地发起六路围攻，持续时间达十个月之久。一九三四年八月，敌六路围攻被彻底粉碎后，四川军阀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只得向蒋介石告急求援，请其派兵入川，统一指挥“剿赤”事宜。蒋介石岂能错过此等良机！他立即制定“川陕会剿”计划，令胡宗南部入川，上官云相等部向川陕边逼近，准备纠合川陕两省的军阀势力，东西堵截，南北夹击，一举消灭我军于大巴山下。短时间内，敌在我根据地周围集结的兵力，达二百个团以上。一旦“会剿”开始，我军势必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

蒋介石“围剿”红军的新战略是：并进合围，步步为营，全面封锁，持久作战。我军要固守根据地，打破敌人的新“围剿”战略，就必须拥有足够支持战争的人力、物力、财力。然而，川陕革命根据地经过连年不断的战争消耗，尤其是十个月反六路围攻战役的巨大消耗，已是元气大损，要粮没粮，要款没款，要兵员没兵员，叫做民穷财尽。

在这种情况下，方面军总部在清江渡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战略方针和任务。会议制定了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的“川陕甘计划”，拟集中主力，打击胡宗南部，夺取甘（肃）南的碧口及文（县）、武（都）、成（县）、

康（县）地区，补充自己，冲破敌人的“川陕会剿”。接着，我军即发起广（元）昭（化）战役。但这仗打得不理想，未能消灭胡宗南伸进四川的力量，只好另寻战机。那时，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已转移到川黔边，急需四方面军策应。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央电令我军全力西渡嘉陵江，在广大无堡垒地带机动作战，策应红一方面军从泸州上游渡江入川。据此，我们重新调整部署，一面令部队迅速造船；一面以一部兵力出击陕（西）南，调动沿江敌人，为强渡嘉陵江创造条件。

陕南战役，达到了调动沿江敌人的目的。但红一方面军土城一战受阻，决定改向川黔滇边转移。我军主力集中在嘉陵江东岸的苍溪、旺苍、南江、巴中间，如箭在弦上，非进不可。方面军总部决定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一是为了策应红一方面军北上；二是为了创造战机，进取甘南，实现“川陕甘计划”。

嘉陵江西岸北起广元，南至南部沿江防线，由川敌邓锡侯、田颂尧两军扼守。

三月二十八日夜，方面军总部下达了渡江命令。位于苍溪以南塔子山附近的中纵队三十军，首先强渡成功，席卷沿岸守敌。阆中以北的左纵队九军及苍溪以北的右纵队三十一军，亦相继突破敌江防，向纵深发展。次日，第二梯队四军渡江，投入战斗。我各路部队如猛虎扑羊，横扫沿江敌人，取南部，克剑阁，四月二日一举拿下天险剑门关，进而攻占昭化，包围广元，沿江四百里的江防地段，均落入我手。战役第一阶段，至此结束。

第二阶段是进击，西向摧毁敌人的纵深防御，解除我进取甘南的后顾之忧。我以一部兵力居右，扼阻胡宗南部南下；一部兵力居左，监视田頌尧部北进；而以主力径取梓潼、江油、中坝，打击邓锡侯部。邓锡侯为解江油之围，亲率十八个团从绵阳北进，被我在江油附近打援，歼敌四个团，余敌溃逃而去。我军乘胜进占中坝、彰明、北川。强渡嘉陵江战役，遂于四月二十一日结束。

战役历时二十四天。我军跨江而进，横扫直荡，先后攻克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青川、平武、彰明、北川等九座县城，歼敌十二个多团，共一万余人。因张国焘迟疑不决，致使北进甘南的战机丧失，“川陕甘计划”未能实现。

总之，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革命根据地，有多方面的原因。优势敌人的联合压迫，根据地民穷财尽，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需要等等因素，决定我军主力西渡嘉陵江，另寻出路，图存发展。这与整个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密切相关。

接应中央红军 创建新的根据地

一九三五年五月初，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继续北上，准备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西进川西北，接应中央红军，遂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行动方针。

蒋介石为防止我一、四方面军“合股川西”，以便各个击破，调动刘湘、邓锡侯、孙震、胡宗南等部，四面

围堵，企图将我军主力聚歼于江油、中坝地区。五月上旬，我军先后撤出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向岷江地区西进，沿途经激烈战斗，突破邓锡侯在土门、北川河谷设置的数道防线，中旬进占茂县（今茂汶羌族自治县）。继以一部沿岷江南下，控制了文镇关、雁门关、威州等要点，进克理县，逼近汶川。另一部沿岷江北上，进据松潘以南的镇江关及平武以南的片口等地。

两军会师，指日可待。我们一面指挥前线部队，扼阻川敌和胡宗南部的进攻；一面分兵发动群众，筹集粮食、被服、牛羊、盐巴、茶叶、羊毛等。在全军开展制作和捐献慰问品的活动，准备迎接红一方面军。五月下旬，我们派第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率领该军第八十八师和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第二十七师各一部，翻山越岭，西进小金地区，消灭守敌邓锡侯一部，迎接红一方面军。

六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在夹金山下。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同志，在懋功（今小金）会见李先念，向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表示亲切慰问。消息传来，大家极为振奋。各部队派人将一批批慰问品，送往一方面军驻地，以表达对党中央和兄弟红军的怀念、爱戴、崇敬之情。

两军会合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确定战略行动方针。也就是说，要解决在哪里建立立脚点，创造根据地，休养生息，再图发展的问题。党中央和毛主席听取了李先念介绍的情况，经过认真研究，提出北上川陕甘边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但张国焘想南下川康边。为此，六月二

十六日，中央政治局于两河口举行会议，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二十八日，作出了“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定。二十九日，中央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以松潘为突破口，打开北进甘南的通道。具体部署是：以岷江东岸四方面军一部，组成岷江支队，由王树声率领，牵制川军及胡宗南部南下。岷江西岸红一、四方面军主力，分三路北进松潘地区及其东北地带，突击胡敌侧背，攻取松潘。右路由陈昌浩率领，中路由徐向前率领，左路由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率领；以中、左两路为中心，迂回攻击松潘守敌。

松潘一带，山高谷深，粮缺人稀，大部队运动十分困难。该城城墙坚厚，地势险要，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根据那里的地形条件和军委的作战部署，我们决心以黑水、芦花为战略后方，北出迂回松潘，实行多路突击。

胡敌发现红军企图攻击松潘，北进甘南，乃将主力二十七个团，集结在松潘、漳腊、南坪一线，凭险扼阻。追击中央红军的薛岳部，亦从川南北进川甘边，配合胡敌截击我军。我一、四方面军主力北进后，懋功、绥靖、北川、茂县、威州等地，均为川军占领。敌前堵后追，企图将红军压入荒无人烟的草地，陷我于不战而毙的绝境。

大敌当前，情势险恶，党和红军的团结，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但是，两军会合后不久，这种团结便受到损害，并且发展到日趋明朗的地步。

察其原因，主要是张国焘怀有野心，想当头头，和中央闹对立。同时，教条主义者对四方面军横加指责，乱扣帽子，也起了不好的作用。当两军会合时，中央主张北上，他则主张南下。他见一方面军损失很大，兵力不多，野心便油然而生。两河口会议后，中央慰问团到理县杂谷脑慰问四方面军，他竟借口“统一军事指挥”，公然伸手向中央要权。此后，又不断向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人家瞧不起四方面军这些老土”等。还派人找一方面军的同志，了解会理会议、遵义会议的情况，实际上是进行反中央的活动。博古、凯丰等教条主义者，亦不顾两军团结的大局，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是“逃跑主义”，还有什么“军阀主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等等，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这套“左”的做法，伤害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感情，也给了张国焘以挑唆的借口。

在芦花，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同志。毛主席亲自将一枚金质五星奖章授予我，以表彰四方面军的英勇斗争。朱德总司令语重心长地同我谈过两军加强团结、取长补短的问题。鉴于一方面军兵员损失很大，我们建议，从四方面军抽几个建制团补给他们；也请他们调些干部来四方面军，以利相互学习。经中央批准，我们调了三个团共三千八百人去一方面军；从一方面军调来李卓然、张宗逊、陈伯钧、李天佑、李聚奎、朱良才等同志，在总部工作或任军参谋

长、政治部主任等职。七月十八日，军委公布了由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的命令。二十日，决定调整军队组织序列，组成红军前敌指挥部，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接着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听取四方面军领导人的汇报。这是一次缓和矛盾、增强团结的会议。中央领导同志对四方面军的英勇斗争，作了肯定评价，没有出现新的争执，大家都很高兴。

为夺取松潘，我和陈昌浩、叶剑英率红军前敌指挥部及一部兵力，于七月二十二日出发，向毛儿盖进军。在毛儿盖，组织部队多路突击松潘。但因敌人兵力集中，凭险固守，我军装备太差，不论正面进攻或迂回突击，均难奏效，只得另辟北进的通道。

北上南下之争 关系着党和红军的命运

一九三五年八月初，军委在毛儿盖召开军事会议，重新研究敌情，确定行动方针和部署。

会议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作战计划，红军主力改道经阿坝出夏（河）洮（河）流域，进据甘南。会上，我和陈昌浩提议，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向一个方向突击。张国焘则主张，兵分左右两路北进。会议采纳了张国焘的意见，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以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取阿坝，控墨洼，继出夏河；以一军、三军、四

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红军前敌指挥部率领，穿越草地，出巴西、班佑地区北进，万一无路可走，再改道经阿坝前进。彭德怀率三军及四军一部殿后，掩护中央机关前进。

张国焘野心不死，会后又节外生枝，要中央政治局开会，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于是，中央政治局举行沙窝会议，作出《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粉碎了张国焘的篡党夺权企图。

八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再次讨论战略行动方针。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沙窝会议上补选为政治局委员）、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聂荣臻、李先念。毛泽东首先发言，强调了北出夏洮流域后向东发展的方针，与会同志均表示同意。最后，毛泽东作了结论，大意是：第一，红军北出后向东还是向西，是全局中的关键。向东，是积极的方针；向西，将陷红军于不利地区。第二，从洮河左岸或右岸前进，可视情况而定。如有可能，即采取包座至岷州的路线，北出甘南。第三，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而不是相反。阿坝可速打一下，但后续部队应不经阿坝而向右路军靠拢。总之，必须以岷州（今岷县）、洮河地区为中心，向东发展，决不应因遇到一些困难，转而向西。会议一致认定，以毛泽东的发言为基本内容，形成《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

这次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部署，变右

路军为北出主力；左路军为战略预备队，从阿坝地区东折，向右路军靠拢，共出甘南。会后，党中央及红军前敌指挥部分别将这一决定，电告已占领阿坝的左路军。

根据毛儿盖会议的决定，右路军从八月二十一日相继出动，开始了征服草地的艰难进军。茫茫大草原，草深过膝，沼泽遍地，荒无人烟。经五昼夜行军，终于穿过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这一带系半农半牧区，粮食和牛羊较多，部队安顿下来，清点人数，补充给养，恢复体力，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据侦察，离巴西、班佑不远的上下包座地区，有胡宗南部一团多兵力扼守，卡住我军北进的通道。胡宗南发现红军穿过草地，遂急派其驻漳腊的伍诚仁第四十九师，星夜驰援包座。该地处于群山之间，周围尽是原始森林，地势险要，碉堡密布，易守而难攻。强占包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

我们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承担。毛主席同意。战斗打响，经三天激战，我歼灭包座守敌及援敌第四十九师，毙伤、俘敌约五千人，缴获大批粮食、马匹、牛羊和军用物资，为全军打开了北进通道。

为集中兵力，火速北进，党中央和我们连电左路军，催其速离阿坝，横穿草地，向右路军靠拢。我们已令四军抽出一个团，预备粮食、马匹、牦牛，以便前往草地接应他们。可是张国焘变了卦，借口噶曲河涨水，部队缺粮，无向导，竟令已到达草地边沿的左路军停止前进，

重返阿坝，准备南下。电报打来打去，毫无结果。北上和南下之争，成为关系党和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

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方针，拒不执行党中央的北进指示。九月八日，电令我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我们夹在中间，十分为难。陈昌浩和我商量，决定由他带上电报，如实向党中央汇报。当晚，中央领导同志召集我们在周恩来驻地开会，针对张国焘南下电令，以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祥七人的名义，电告张国焘，陈说南下之弊与北进之利，着其执行北进方针。张国焘九日复电，仍坚持南下。陈昌浩这时改变了态度，同意执行张国焘的南下命令，我不愿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也同意南下。

十一日凌晨，^①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我们得知后大吃一惊。前面有的干部不明真相，打电话来问：一方面军单独走了，还设警戒哨，我们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过后，我们根据张国焘的命令，率四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再次穿越草地，开始了南下的进军。

^① 另一种说法为10日凌晨。

张国焘的分裂行为 给红军带来极大的损害

南下之初，在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足木脚），张国焘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利用党中央单独率一、三军团北上——一事，大肆煽动，公然另立“中央”，打出了分裂主义的旗帜。会上，朱德、刘伯承同志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严肃斗争。

南下部队，包括红四方面军的五个军及原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即五军、三十二军）。蒋介石发现红军少数兵力北上，大部兵力南下，乃令薛岳等嫡系部队和川军向川西南地区集结，准备与我决战。

我军南下的第一个战役，是攻取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打通进军川西南的通道。总部决定以五军、九军二十五师、三十一军九十三师组成左纵队，沿大金川西岸前进，抢占绥靖、丹巴；以四军、三十军、三十二军及九军二十七师大部组成右纵队，在大金川以东地区进攻，夺取崇化、懋功；三十三军及九军二十七师一个团，驻守马塘、梦笔山地区，屏障红军总司令部；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师部及二七七团、红军大学，留守阿坝，掩护后方。

十月八日，我左、右两路纵队发起进攻。大小金川地区，地势复杂，多高山绝壁、峡谷急流。我军机智英勇，灵活迅速，充分发挥山地战、隘路战、近战、奇袭、夜袭的特长，大胆迂回穿插，斩关夺隘，消灭敌人。十